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四辑）

TuShuGuan FaZhan
Yu XinXi ZiYuan JianShe

图书馆发展 与信息资源建设

孟雪梅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四辑)

图书馆发展与信息 资源建设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孟雪梅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发展与信息资源建设/孟雪梅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12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吴慰慈,陈源蒸主编.第4辑)

ISBN 978-7-5013-5730-7

I. ①图… II. ①孟… III. ①图书馆发展—研究—中国 ②图书馆—信息资源—资源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G25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2878号

书 名 图书馆发展与信息资源建设

著 者 孟雪梅 著

责任编辑 高 爽 王炳乾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nlcpress@nlc.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5730-7

定 价 70.00元

目 录

论先秦史官与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
佛经文献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6)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的特点及作用	(17)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文献收藏特点分析	(27)
论图书馆科学管理与管理现代化	(41)
新时期图书馆非正式组织的管理	(47)
图书馆人力资源盘点及管理战略	(56)
图书馆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宏观调控	(65)
图书馆资源运行的支撑理论研究	(72)
新形势下图书馆资源的科学配置与运行管理	(79)
新形势下高校社科信息需求变化特征与开发策略	(91)
论科技文献的引进	(99)
国际开放存取期刊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107)
三网融合环境下的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研究	(124)
我国中小单位构建机构库阻碍因素及对策分析	(133)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内容与重点	(144)
基于知识创新的信息资源优化建设	(153)
黑龙江省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建设研究	(162)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	(171)
图书馆文献资源网络化建设与信息服务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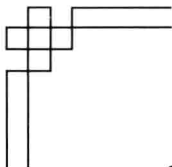
论支撑知识创新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185)
论市场信息资源的建设与开发	(198)
论市场信息、信息市场与社会经济发展	(207)
培育发展我国信息市场的建议与对策	(214)
论中小企业信息系统建设	(220)
论中小企业预警式战略与危机管理系统	(227)
论中小企业信息系统战略	(232)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及信息网络建设	(242)
我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分析及展望	(251)
黑龙江省企业信息系统建设现状分析与模式探讨	(263)
以信息化带动黑龙江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战略研究 ...	(274)
支撑海西知识创新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286)
 主要论著目录	 (296)

论先秦史官与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 史官与图书馆的产生

对于史官,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观堂集抄·释史》中指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又称:“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持簿书也……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史之本意,为持书之人。”由此可见,在先秦各代史官是从事执笔、记事和撰述书籍、掌管典策之人。他们在官府中具有重要地位,终身事之,其职务非一般官员所能胜任。史被视为专技,成为专门职业。在我国,史载最早的史官是《世本·作篇》所载的“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苍颉,祖侑居其职矣”。这虽无实物验证,仅是传说,但我们却可以推断,在殷商以前,史官就产生了。

由于史官从事王朝内外的一切重要的文化活动。如记言记事、保管文书档案、写作和整理王朝史料等,史官的设立和职司就成为图书馆、档案馆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即有了史官,才有了图书馆的产生。而周代史官的收藏,历来被学术界公认是图书馆的起源。如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宣告成立时曾称:“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达书名于四方。我国之有图书馆,盖已权舆于是。”由此可见,先秦史官的设置对我国图书馆的产生起着重大作用。



2 史官与古代典籍的形成

在先秦,史官是创造文化财富和垄断文化财富的人,他和书籍的形成有紧密的联系。从殷商的甲骨卜辞中,我们发现了不少贞人(史官)的名字。董作宾在《大龟四版考释》中说:“贞卜命龟之辞,有时王亲为之,有时使史官为之。其为书贞卜人名,则无足疑。”由此看出,殷商时代商王做事常用占卜来决定,而史官的任务就是记录占卜的结果,并把卜辞保存起来,以备统治者日后查考验证。相传,在上古国家设有左史、右史,以事天子。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当时的政治大事,统治者的言论、行为都由史官记录下来。当然,这些记录都属档案性质,殷代的典籍,以及殷墟卜辞、青铜器铭文等也都是当时史官或卜人记录的档案。这些材料既是当时宗教迷信活动的记录,也是古代社会生活的记载,史官和巫师将这些占卜用的甲骨积累并加以保管整理,就形成了最初的藏书。

在先秦古籍中,对史官撰书的记载主要有“史载笔”(《礼记·曲礼上》)、“史为书”(《左氏春秋传》襄公十四年)、“史献书”(《国语·周语上》)、“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礼记·五制》)等。这些记载证明先秦典籍多撰自史官之手,《诗经》三百篇其中就有不少是史官所著。

3 史官与古代典籍管理

古代史官的职责主要有二,除了专门著书外,还要掌管藏书。在殷商时代,史官就有了管理文献的制度,对文献进行合理地分类。从发掘出来的资料看,殷商甲骨文献与其他类型文献(简策、帛书等)是严格区分的;在存储和埋藏的甲骨中,刻辞的甲骨与备用的甲骨是分



开的,刻辞的甲骨又分别以时代为序,同一时代的刻辞甲骨存放地区较集中,且成套甲骨也集中存储。到了周代,管理文献的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藏书依处所不同分为王室宗庙藏书、太史府藏书与盟府藏书三类。宗庙收藏的文献是供周王专用的国家重要文献,太史府藏书除按王朝与诸侯两个级区分以外,依周代的史官制度分类保管。盟府藏书则分为由王室与诸侯两层收藏,主要是有关盟约的档案文件。总之,这些藏书的管理方法是先按收藏处所划分,再按职官职责分别保管。最后按事务分类存储。

对于史官司掌典籍,古籍中记载有:“大史秉书”(《尚书·顾命》)、“史掌官书以赞治”(《周礼·天官冢宰》)、“大史守典奉法”(《礼记·月令》)、“史不失书”(《国语·楚语上》)等。我国古代典籍之所以异常丰富,并能保存流传至今,这是与上古设置史官记言记事、编著书籍、掌管书籍有着直接联系。

4 史官与古代典籍的利用

先秦王室所设专门处所收藏的文献均由史官分类管理,有序存储,制度严明,分工较细,其目的就是为有效地利用这些文献。

在殷商对文献的利用均与崇奉神意有关。因为商代的“作册”“御史”等史官和“卜”“贞”等担任宗教职务的官吏,都是文化、宗教事务官员。他们要对大至国家祭祀大典、征战、王权继承,小至王室打猎、出游以及风雨年成进行占卜凶吉,故须反复使月历书。占卜后,史官要刻辞记事,妥善保管,以备日后查考验证。卜辞中有君王和臣下省视卜辞的大量记载,这就充分证明了王室利用文献之频繁。由于史官保管着占卜之辞、图书典章,对历史典故最熟悉,王室遇有大事必向史官垂询。据此,史官也掌握着谏君诫臣的史实,反映出利用文献的情况。

在周代,王室利用文献更为频繁。为此,古书上记载较多。如:

“周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匭中”(《尚书·金縢》)、“周成王太恐,乃发金縢之柜,察周公之册,知周公乃有盛德”(《越绝书·越绝吴内传》)。有关周王朝的太史府所藏图书的利用记载有:“晋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此外,设于王室与诸侯的盟府所收藏的盟约档案,也是供人们查阅的,如晋国官员士弥牟对宋国大夫仲几说过:“卜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晋视诸故府。”这是利用盟府文献的实例。

5 史官制度的演化与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商周史官是延续的,商代已有史官设立,而到了周代,由于文献的收藏条件得到了改善,史官有了较细的分工,分类与保管制度得到了明显进展。周王朝建立后,为了治理政治事务,记录朝廷时事,办理王室公文,传达政令,掌管文书、档案,分别设置了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如成康之前,有太史、中史、内史、乍册、史,之后则有太史、内史、内史尹、史、乍册、乍册内史、乍命内史、命尹、尹民等官名。据《周礼·春官宗伯下》所载,在周代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小史掌邦之志(王家谱系),内史掌书王命(王对百官的升迁赏罚之法令与记录),外史掌书外令(王与诸侯之间的有关文书),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赞书(赞书面授法令)。史官按各自的职责分工收藏有关文献资料,界限分明。其中,大史是众史之长。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也仿效中央设立史官职位,因为那时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政治形势激烈动荡,各诸侯国为了在列国中提高其政治地位,以争夺霸权。同时为了在国内强化政治统治,以完善国家机构,于是就采取了藏典设史的措施。其中,设史最早的是秦国。《初学记·史传》引司马迁的话说:“是则周之列国,亦各有史官书事记言,以载讨典。”《史通·史官建置》也说:“诸侯列国亦各有史

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西周、东周时,史官见于古籍记载者约三十处,诸侯国的史官见于古籍记载三十三处。由此可见,当时史官设置已相当普遍。但诸侯国设史在数量和规模上较中央机构要小,且从属于中央王史,听命于中央机构。周王室五史与诸侯之史构成了上下完整的史官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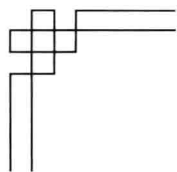
各诸侯国藏典设史的出现,改变了殷商以来史官专事天子的状况,奴隶制社会所创立的史官制度被摧毁了,后代虽继续设有史官,但其地位远不如从前重要。而且,诸侯国藏典设史在古代藏书事业史上第一次打破了过去中央朝廷一统天下的单一的官府藏书形式,发展为由中央官府藏书到地方官府藏书的多种形式,这在古代图书馆事业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 1 谢灼华.中国图书及图书馆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 2 李更旺.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史(讲义),1983
- 3 金毓业.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原载于《图书馆学研究》,1999(2)

* 参考文献为后补,原文没有刊出。



佛经文献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佛教源自印度,是亚洲各国人民共同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佛经文献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它是我国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由于佛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已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密切结合,影响日隆,佛经数量也随之增多,对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传承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佛经翻译与中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后,形成北传汉语系的佛教和藏语系的佛教。佛经翻译是佛教传播的基础工作,是古代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它的开展加强了中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1. 佛经翻译揭开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太子安清,字世高,此年到洛阳,他在中土二十多年里共译佛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他也是史载第一位译经外僧。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所建白马寺是封建社会官造的第一座佛寺,也是传教译经之所。早期的佛经翻译主要依靠西域来华僧人,如迦叶摩腾、竺法兰、支类迦讖等均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



佛经翻译事业在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兴盛局面。汉末三国时许多西域僧人东来,翻译人数增加。到洛阳的名僧有天竺的县柯迦罗,吴国的译经事业也十分兴盛,大月氏人支谦就是当时著名的译经大师,此外还有名僧康僧会。三国时翻译的佛经据《开元释教录》载共二百〇一部、四百三十五卷。西晋时,译出的各种经、律、集、传达三百三十三部,其中著名的译经大师是竺法护。到十六国东晋时,译经事业发生了变化,从私人译经发展到政府支持的译经场,促使佛经数量剧增,佛教典籍收藏也集中到寺院,寺院既是译经之地,也是传经之所。当时最著名的、译经最多的是道安、鸠摩罗什。道安作序并注释的佛经二十二卷,而鸠摩罗什在长安的译经道场有上千人,经十年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们的译经活动,丰富了佛教典籍,并对后来的佛教文学产生了影响。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所载,到南北朝末,一共有译经一九一三部,四五七五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巴次大陆等地来中国从事佛经翻译的僧徒有七十多人,他们的活动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中国图书的内容。当时,除了西僧东来外,也有中国僧徒西行取经的。史传记载的有八十九人,法显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隋、唐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译经事业也发展到顶峰,其译经特点是规模庞大,由译场组织变成了翻译馆。在隋代,佛教典籍日增,据释法琳《辨正论》说,“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凡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八十有六卷”。炀帝早在平陈之后,即“于扬州装补故经”“合六百一十二藏”“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由此可见译经的数量是空前的。

唐代,佛经翻译和整理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他游学印度十七年,是法相宗在中国的创始人,一生中共译出佛教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所译佛经的质量和数量都是最高的。玄奘以后无人望其项背。

在宋代,宋太宗也致力于翻译佛经,建立了译经院和印经院,普及佛教经典。据南宋诗人范成大的旅行记《吴船录》所收《西域行程》记

载;公元964年,宋廷“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佛经翻译工作,辽、夏、金也开展过,但以元代最为活跃,翻译汉文书籍中佛经较多,必兰纳识里还曾运用各种文字译经,因此元代佛经译书种类、数量众多、盛极一时。历朝的佛经翻译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佛经翻译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由于佛教流传范围广,中印佛教文化交流频繁,我国各民族地区均受其影响,故而竞相翻译佛经,极大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桑耶寺的佛经翻译就很有代表性。公元7—8世纪,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和东亚的中国有三大佛教道场甚为引人注目,这就是中天竺摩竭陀国的那烂陀寺(Nalanda),唐朝都城长安的大慈恩寺,吐蕃山南地区的桑耶寺(bsam yas)。桑耶寺位于今西藏扎囊县境内的雅鲁藏布江北岸,它可算是西藏寺庙之祖,是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寺院。在历史时期,该寺因设有固定的译场,将大量的梵、汉文佛经翻译成藏文,而且藏族佛经史上有名的所谓“七试人”就出家于此寺,所以享誉藏区。赤松德赞赞普曾派人到印度去迎请高僧大德到吐蕃弘扬佛法,并派出一批人到印度去留学。这两项措施都和翻译佛经、传授印度佛法有直接的关系。

依布顿大师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得知,从印度请来的高僧有无垢友、佛密、寂藏、清静狮子等人。当时,在桑耶寺内设有专门的译经场,从事梵文和汉文佛教经典的翻译。据《拔协》记载,大译师耶喜旺保主要担任印度文佛经的翻译,而以克什米尔的阿难陀和甲·梅果为助手。其中,翻译的印度佛经有《根本四部》《四阿含》《二十根本教诫》《譬喻部》《阿毗达磨之声闻俱舍》等。在此之前,印度的大乘经典大量藏在那烂陀寺内,但那烂陀寺遭受火灾的洗劫之后,许多经典化为乌有。所幸这些经典在汉地早有译本流传,赤松德赞赞普便组织起三百人的翻译队伍,邀集藏、印、汉三方高僧力量,由赞普供给生活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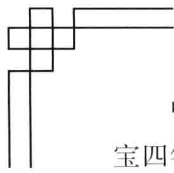
由王妃降秋杰亲自主持法台,管理僧团事务,举行大规模的汉文佛经翻译。这对佛经文化的保存起了巨大作用,为以后从汉、藏文佛经入手,恢复已失传的梵文佛经奠定了基础。汉、藏、印多方僧人云集桑耶寺译经场,互相切磋,互为补充,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据说,824年在丹噶尔宫由吐蕃众译师将所译经典的名字、卷帙、偈颂数目等编写成目录取名为《丹噶尔目录》(Idan-dkardkar-chag),这是现存的吐蕃译经史上的第一部目录。此目录收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内,共收经论达七百余种,其中有三十四种经书是自汉文译成藏文的。

二、佛经文献与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

佛教的东渐和南传,客观上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佛教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它也开启了中外图书文化交往的大门,推动了古代中外官府和民间的友好往来。佛经文献东传的主要国家是朝鲜和日本,南传主要是越南。

1. 佛经文献在中朝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汉语系佛教在公元4世纪传到朝鲜,隋唐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密切,1966年在朝鲜发现的刊刻在8世纪初的汉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就证明了这一点。自公元918年高丽王朝建立后,朝鲜与当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与交流进一步发展。佛教文献交流是中朝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据文献记载,高丽“国人好佛法”,仅京城“开城府有寺七十余区”。宋初高丽僧人义通“来游中国”,开宝元年(968)到明州(今浙江宁波)。众多高丽僧人渡海入宋的目的是求法、求佛典,或游拜圣迹,形成了当时佛教交流的一大特色,即高丽人通过在宋搜集、购买佛教经典并传送回高丽,以满足高丽佛教发展和佛学研究的需求。



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的外传促进了高丽的佛教文化发展。在宋开宝四年(971),在成都开雕印刷《大藏经》(又称《开宝藏》《蜀藏》,共五千零四十八卷),历经十三年告成,高丽人闻讯而两次遣使求宋廷赐予《大藏经》,使雕版印本《大藏经》首传高丽。此后高丽又多次向宋遣使求赐《大藏经》,据史书记载,高丽向宋求得《大藏经》共七部,并依宋《开宝藏》复刻高丽《大藏经》,共五千九百二十四卷,使高丽佛教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高丽僧人义天在中国和高丽佛教文化交流中贡献较大,他入宋求法多年,回国后对佛经进行了整理。由于中国唐以前佛经遭受战乱多已亡佚,但在高丽仍保存不少隋唐时期传入的佛籍,随着义天入宋,使不少佚经又重返中土,对我国古代佛教典籍保藏意义重大。到元代,高丽到中国的求法僧人数量剧增,更广泛地促进了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1290年,元朝派遣工匠去朝鲜修补海印寺所藏经版。1308年,朝鲜以新版《高丽藏》进献元庭,1314年又将另一部赠送蒙古。1312年,高丽王向元帝致敬,下令印制五十部《高丽藏》分送各寺院。1314年,高丽从中国购置了一万卷书籍,元朝又加赠藏书四千卷,这一切交流活动,都和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2. 佛经文献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6世纪中叶,汉语系佛教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在进入13世纪镰仓时代之后形成许多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这些佛教宗派中,净土宗、真宗、日莲宗就是日本僧人依据并发挥汉译佛经和中国佛教著述新成立的宗派。日本众多佛教宗派所用的主要经典是汉译佛经和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它们所奉的教祖、祖庭也可以追溯到中国,中国古代出版的“大藏经”至今在日本仍有收藏。历史上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人很多,中国高僧鉴真、道隆、正念、祖元、一宁、隐元等,均携佛经文献赴日传教,而到中国的日本的求法高僧最澄、空海、圆仁、圆珍、荣西、道元等,每返日本均带大量佛经。如在630—834年间,日本共派遣唐使团十五



次,许多高僧赴唐学习并留唐多年,中日文化交往密切,佛教传播是其中重要内容。五代后周时,杭州雕印的佛经《宝篋印心咒经》八万四千尺已经传入日本。据文献记载,吴越国人了解到天台宗的佛经多有缺失,而在日本却有保留,还托吴越商人带去黄金五百两到日本补购。983年,宋太宗还以《开宝藏》佛经一部赐给日本僧人。这些都证明,佛经文献不仅在当时中日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促进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往来,还推动了日本的印书事业。

此外,佛教还南传至越南,早期的越南版中国书籍中,佛经占有较大比例。越南虽然从未印过全套佛藏,但印了不少佛教著作,至今河内还保存1652—1924年间出版的佛经四百种以上,其中,有二十种为越南人著。由此可见,中国佛教文化对朝鲜、日本、越南的文化发展均产生深远影响和促进作用。

三、佛经文献与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深远,它被历代统治者视作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武器而加以保护。因此,佛经文献历代皆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历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演化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佐证,丰富了古代文献版本目录的类型,促进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

1. 丰富了图书版本和类型

佛经的写印方式主要有写、印两种。因而产生了写本和印本两类。在雕版印刷术产生前的漫长岁月中,佛经流传主要靠写本。写本中最多的是墨书,书写形式有横行、竖行两种,此外还有朱书、色书等,有些佛经中带有彩绘插图。从图书发展史来看,汉至唐,佛经写本较多,但流传下来很少,多在敦煌遗书之中。唐至宋、辽、夏代,写经数量

多,流传下来也多,如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辽代三件写经,西夏时的《光明最胜王》等。自宋以后,几不见佛经写本,而刻本日增。

佛经印本主要有私刻、坊刻、官刻,而唐代佛经多为民间的私刻和坊刻。如1944年成都唐墓出土成都卞家刻印的《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家所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本《妙法莲华经》等。五代以后,官刻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私刻的五代刻本,宋刻本、金刻本、明刻本仍为数不少。其中,金代山西民间集资兴刻的《大藏经》(又称《金藏》《赵城藏》,七千一百八十二卷)较为有名。这一时期刻印地区主要在浙、闽、蜀等地。

官刻佛经是五代以后出现的,它在数量和质量上要优于私刻。特别是南北两宋时期,我国雕版印刷处于黄金时代,官刻释经较多,当时释经在各地开雕,而印刷则统一在京师进行,宋开宝四年雕刻了佛教总集《开宝藏》,受其影响,辽刊刻了《契丹藏》(又称《辽藏》)。在明代,官刻佛经专门由司礼监统属的经厂和番经厂负责,所刻佛经称为经厂本。

由于官、私、坊均刊刻佛经文献,而且遍布各民族、各地区,使我国古代佛经文献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装帧形式多样,有卷轴装、经折装、册页装、线装等。书写材料多为纸绢,许多佛经都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具有极高的收藏和使用价值。

2. 完善了目录体制

佛经目录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灿烂夺目的瑰宝。它不仅对研究我国各朝各代佛教事业发展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完善目录体制、丰富目录类型、研究目录体制的发展、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佛经目录编制最早始于晋代。那时,由于佛经增加,佛经目录一时繁荣。仅三百多年间,有史可查者就达三十多部。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经目录编制的发展阶段。我国第一部佛经目录是晋代名僧道安编辑的《综理众经目录》,该目录是对当时中国佛教